

梁实秋怀人丛录

梁
实
秋
著



梁实秋怀人丛录

梁实秋 著

编选：刘天华 维 辛

责任编辑：高 骏

封面设计：李 萌

版式设计：张智勇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850×1168毫米大32开10.625印张213千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100册 定价：5.30元

ISBN 7-5043-0614-2/I·65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北京怀仁学会善秉仁司铎在王府井安福楼招宴留影。
后排右起：善司铎、章川岛、沈从文、常风、冯至、赵君（怀仁学会职员）；
前排右起：李长之、梁实秋、杨振声、俞平伯、朱光潜。

目 录

辜鸿铭先生轶事	(1)
悼朱湘先生	(3)
闻一多在珂泉	(8)
谈徐志摩	(18)
记梁任公先生的 一次演讲	(62)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65)
“但恨不见替人”	(70)
记张自忠将军	(72)
悼齐如山先生	(76)
谈闻一多	(81)

胡适之先生论诗	(159)	关于徐志摩	(222)
悼念道藩先生	(167)	方令孺其人	(225)
忆老舍	(171)	回首旧游——纪念	
忆冰心	(177)	徐志摩逝世	
胡适先生二三事	(191)	五十周年	(230)
忆岂明老人	(199)	关于徐志摩的	
悼念陈通伯先生	(204)	一封信	(234)
重印《西滢闲话》序	(206)	徐志摩的诗与文	(237)
忆沈从文	(209)	悼叶公超先生	(241)
忆杨今甫	(213)	叶公超二三事	(244)
悼念夏济安先生	(219)	关于老舍	(247)

怀念胡适先生	(257)	忆沈从文	(326)
忆周作人先生	(271)	编后记	(329)
忆老舍	(278)		
记卢冀野	(286)		
旧笺拾零	(292)		
陆小曼的山水长卷	(301)		
悼念余上沅	(306)		
赛珍珠与徐志摩	(314)		
忆李长之	(317)		
“不要被人牵着 鼻子走”	(322)		

辜鸿铭先生轶事

辜鸿铭先生以茶壶譬丈夫，以茶杯譬妻子，故赞成多妻制，诚怪论也。

先生之怪论甚多，常告人以姓辜之故，谓始祖寔为罪犯。又言始祖犯罪，不足引以为羞；若数典忘祖，方属可耻云。

先生深于英国文学之素养。或叩以养成之道，曰：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作根基。又言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先生极赞成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

先生之书法，极天真烂漫之致，别字虽不甚多，亦非极少。盖先生生于异国，学于苏格兰，比壮年入张之洞幕，始沉潜于故邦载籍云。

先生好选《诗经》中成句，译英文诗，虽未能天衣无缝，亦颇极传神之妙，惜以古衣冠加于无色民族之身上耳。先生以“情”译 poetry，以“理”译 philosophy，以“事”译 History，以“物”

译 Science,以“阴阳”译 Physic,以“五行”译 Chemistry,以“红福”译 Juno,以“清福”译 Minerva,以“艳福”译 Venus,于此可见其融合中外之精神。

先生喜征逐之乐,顾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者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先生对于妓者颇有同情,恒操英语曰:Prostitute者,Destitute 也。(意谓卖淫者卖穷也。)

先生多情而不专,夫人在一位以上。尝娶日妇,妇死哭之悲,悼亡之痛,历久不渝。先生尝患贫,顾一闻丐者呼号之声,立即拔关而出,界以小银币一二枚,勃谿之声,尝因之而起。

先生操多种方言,通几国文字;日之通士,尤敬慕先生,故日本人所办之英文报纸,常发表先生忠君爱国之文字。文中畅引中国经典,滔滔不绝,其引文之长,令人兴喧宾夺主之感,顾趣味弥永,凡读其文者只觉其长,并不觉其臭。

原载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上海《时事新报·青光》

悼朱湘先生

偶于报端得知朱湘先生死耗，但尚不知其详。文坛又弱一个，这是很令人难过的。我和朱先生幼年同学，近年来并无交往，然于友辈处亦当得知其消息，故于朱先生平素为人及其造诣，亦可以说略知一二。朱先生读书之勤，用力之专是很少见的。可惜的是他的神经从很早的时候就有很重的变态的现象，这由于早年家庭环境不良，抑是由于遗传，我可不知道。他的精神变态，愈演愈烈，以至于投江自尽，真是极悲惨的事。关于他的身世遭遇理解最深者在朋友中无过于闻一多饶子离二位。我想他们一定会写一点文字，纪念这位亡友的。

在上海申报自由谈(十二月十七日、十九日)有两篇追悼朱湘先生的文章略谓：“他的死，可说完全是受社会的逼迫。固然，他的性情，不免孤僻，这是他的一般朋友所共知，不过生活的不安，社会对他的漠视，即是他自杀的近因，他不知道现在社会，只认得金钱，只认得势利，只认得权力，天才的诗人，贫苦的文士，在它的眼下！朱湘先生他既不会蝇营狗苟，亦不懂

得争权夺利，所以在这黑暗的社会中，只得牺牲一生了。我恐怕现在在社会的压迫下，度着困苦的生活，同他一样境遇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朱湘先生之自杀，正是现代社会黑暗的反映，也正是现代社会不能尊重文人的表现。”（余文伟）

“这件事报纸上面好像没有什么记载，其实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他的意义并不限于朱湘一个人。这位诗人的性情据说非常孤傲，自视很高。据他想像他这样一个诗人，虽然不能像外国的桂冠诗人一样，有什么封号；起码也应该使他生活得舒服一点，使他有心情写诗。可是这个混乱的中国社会，不但不给他舒服的生活，而且简直不给他生活，这样冷酷他自然是感到的。他不能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既不承认能够纵容他，把他像花草一样培养起来的某种环境已经崩溃，更不相信那个光明灿烂的时期真会实现，所以他只看到一片深沉的黑暗。这种饮命的绝望，使他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使他不得不用自杀来解决内心的苦闷。

朱湘已经死了，跟他选上这条死路的，恐怕在这大批彷徨践路的智识群中，还有不少候补者罢。”（何家槐）

这两位作者认定朱先生之自杀“完全是受社会的逼迫”，这个混乱的中国社会，“简直不给他生活”。对于死人，照例是应该说好话的。对于像朱先生这样有成绩的文人之死，自然格外的值得同情。不过，余何两位的文章，似乎太动了情感，一般不识朱先生的人，读了将起一种不十分正确的印象，就以为朱先生之死，一古脑儿的由“社会”负责。

中国社会之“混乱”自然是一件事实，在这社会中而要求“生活得舒服一点”的确是不容易。不过以朱湘先生这一个来说，我觉得他的死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大部分责任，社会之“冷酷”负小部分责任。我想凡认识朱先生的将同意于我这判断。朱先生以“留学生”“大学教授”的资格和他的实学而要求“生活的舒服一点”不是不可能的。不幸朱先生的脾气似乎太孤高了一点，不客气的说，太怪僻了一点，所以和社会不能调谐。若说“社会”偏偏要和文人作对，偏偏不给他生活，偏偏要逼他死，则我以为社会的“冷酷”，尚不至于“冷酷”至此！

文人有一种毛病，即以为社会的待遇太菲薄。总以为我能作诗，我能写小说，我能作批评，而何以社会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点。其实文人也不过是人群中之一部分；凭什么他应该要求生活的舒适？他不反躬问问自己究竟贡献了多少？譬如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的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朱湘先生，并不是这样的人，他的人品是清高的，他一方面不同污合流的摄取社会的荣利，他另一方面也不嚷穷叫苦取媚读者。当今的文人，最擅长的是“以贫骄人”好像他的穷即是他的过人的长处，此真无赖之至。若以为朱先生之死完全由于社会的逼迫，岂非厚诬死者？

本来靠卖文为生是很苦的，不独于中国为然。在外国因为读书识字的人多，所以出版事业是赢利的大商业，因之文人的报酬亦较优厚，然试思 18 世纪之前，又几曾听说有以卖文为

生的文学家？大约除了家中富有或蒙贵人赏拔的人才能专门从事著述。从近代眼光看来，受贵人赏拔是件可耻的事。在中国文人一向是清苦的，在如今凋弊的社会里自然是更要艰窘。据何家槐君所说：

“他的文章近几年来发表得很少，而且诗是卖不起钱的，要想靠这个维持生活真是梦想。听说有家杂志要他的诗稿，因他要求四元一行，那位素爱揩油的编辑就很生气的拒绝刊登。”

我所怪的不是编辑先生之“拒绝刊登”，而是朱先生的“要求四元一行”，当然那位编辑先生之“很生气”是大可不必的。文学只好当做副业，并且当做副业之后对于文学并无妨。有些诗人以为能写十行八行诗之后便自命不凡的以为其他职业尽是庸俗，这实在是误解。我们看古往今来的多少文学家，有几人以文学为职业？当今有不少的青年，对于文学富有嗜好，而于为人处世之道遂不讲求，这不是健康的现象。我于哀悼朱湘先生之余，不禁得想起了这些话说。

朱先生之死是否完全由于社会逼迫，抑是还有其它错综的情形，尚有待于事实的说明。知其是精神错乱，他自己当然也很难负责，只能归之于命运。不过精神并未错乱的文人们，应该知道自爱，应该有健康的意志，理性，和毅力，来面对这混乱的社会罢？

还有一点，写诗是和许多别种工作一样，并不见得一定要以“生活舒服一点”为先决条件的，饿了肚子当然是不好工作的。“穷而后工”也不过是一句解嘲的话。然而，若谓“生活得

舒服一点”以后才能“有心情写诗”，这种理论我是不同意的。现下的诗人往往写下四行八行的短诗，便在后而缀上“于莱茵河边”“于西子湖畔”这真令人做呕。诗是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写的，不必一定要到风景美的地方去。诗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写的，不必一定要在“舒服”的时候。所谓“有心情写诗”，那“心情”不是视“舒服”与否而存减的。诗人并没有理由特别的要求生活舒适。社会对诗人特别的推崇与供养，自然是很好的事，可是在诗人那方面并不该怨天尤人的要求供养。要做诗人应先做人。这并非是对朱湘先生的微辞，朱湘先生之志行高洁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的自杀是值得我们哀悼的。不过生活着的文人们若是借着朱先生之死而发牢骚，那是不值得同情的。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益世报》

闻一多在珂泉

闻一多在1922年出国，往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对于到外国去，闻一多并不怎样热心。那时候，他是以诗人和艺术家自居的，而且他崇拜的是唯美主义。他觉得美国的物质文明尽管发达，那里的生活未必能适合他的要求。对于本国的文学艺术他一向有极浓厚的兴趣。他对我说过，他根本不想到美国去，不过既有这么一个机会，走一趟也好。

一多在船上写了一封信来，他说：

“我在这海上飘浮的六国饭店里笼着，物质的供奉奢华极了，但是我的精神乃在莫大的压迫之下。我初以为渡海底生涯定是很沉寂幽雅辽阔的；我在未上船以前，又时时在想着在汉口某客栈看见的一幅八仙渡海底画，又时时想着郭沫若君底这节诗——

无边天海呀！

一个水银的浮沤！

上有星汉湛波，

下有融晶泛流，
正是有生之伦睡眠时候。
我独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
遥遥的，遥遥的，
在一只象牙舟上翘首。

但是既上船后，大失所望。城市生活不但是陆地的，水上也有城市生活。我在烦闷时愈加渴念我在清华的朋友。这里竟连一个能与谈话的人都找不着。他们不但不能同你讲话，并且闹的你起坐不宁。走到这里是“麻雀”，走到那里又是“五百”；散步他拦着你的道路，静坐扰乱你的思想。我的诗被他们戕害到几底于零，到了日本海峡及神户之布引沱等胜地，我竟没有半句诗的赞叹歌讴。不是到了胜地一定得作诗，但是胜地若不能引起诗兴，商店工厂还能么？……”

他到了美国之后 8 月 14 日自芝加哥写的一封信，首尾是这样的：

“在清华时，实秋同我谈话，常愁到了美国有一天被碾死在汽车轮下。我现在很欢喜的告诉他，我还能写信证明现在我还没有碾死。但是将来死不死我可不敢担保。……

……………

啊！我到芝加哥才一个星期，我已厌恶这生活了！”

他虽厌恶芝加哥的烦嚣，但他对美国的文化却很震惊，他在这第一封信里就说：“美国人审美底程度是比我们高多了。讲到这里令我起疑问了。何以机械与艺术两个绝不相容的东西能够同时发展到这种地步呢？”

一多在芝加哥的生活相当无聊，学画画是些石膏素描，顶多画个人体，油画还谈不上。图画最要紧的是这一段苦功，但是这与一多的个性不能适合。他在九月十九日来信说：

“实秋：

阴雨终朝，清愁如织；忽忆放翁“欲知白日飞升法，尽在焚香听雨中”之句，即起焚香，冀以“雅”化此闷雨。不料雨听无声，香焚不燃，未免大扫兴会也。灵感久渴，昨晚忽于枕上有得，难穷落月之思，倘荷骊珠之报？近复细读昌黎，得笔记累楮盈寸，以为异日归国躬耕砚田之资本耳。草此藉候文安。”

可见他对于中国文学未能忘情。他于翌年二月十五来信说：

“我不应该作一个西方的画家，无论我有多少的天才！我现在学西方的绘画是为将来作一个美术批评家。我若有所创作，定不在纯粹的西画里。但是我最希望的是作一个艺术的宣道者，不是艺术的创造者。”

可见他对于绘画之终于不能专心，是早已有了预感。又因为青春时期只身远游，感触亦多，他不能安心在芝加哥再住下去。他于5月29日来信说：

“芝加哥我也不想久居。本想到波斯顿，今日接到你的信，忽又想起陪你上 Colorado 住个一年半载，也不错。你不反对罢？”

我想他既要学画，当然应该在芝加哥熬下去。虽然我也很希望他能来珂泉和我一起读书，但是我并不愿妨碍他的图画的学习。所以我并不鼓励他到珂泉来。

我在1923年秋到了珂泉 Colorado Springs，这是一座西部的小城，有一个大学在此地，在一些西部小规模的大学里，这算是比较好的一个。这里的风景可太好了，因为这城市就在落矶山下，紧靠在那终年积雪的派克峰脚下，到处是风景区。我到了这里之后，买了十二张风景片寄给一多，未署一字，我的意思只是报告他我已到了此地，并且用这里的风景片挠他一下。没想到，没过一个星期的工夫，一多提着一只小箱子来了。

一多来到珂泉，是他抛弃绘画专攻文学的一个关键。

珂罗拉多大学有美术系，一多是这系里唯一的中国学生。系主任利明斯女士，姊妹两个都是老处女。一个教画，一个教理论。美国西部人士对于中国学生常有好感，一多的天才和性格